

从石峁遗址看华夏玉石之路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文学与传媒系 杨骊

2013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考古大会上,石峁遗址入选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自2012年入选“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以来,石峁遗址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宏伟壮观的石砌城墙与数量众多的玉器,显示了它在史前文明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少专家惊呼,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这一发现很可能改写中华文明史。以此为缘起,2013年6月,以“探寻中国梦的缘起,重现失落的远古文明”为宗旨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在陕西召开,来自考古学界、收藏界、文学人类学的专家学者围绕会议宗旨展开讨论,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研究亮点,开启了考古学与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

作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石峁古城对中华文明探源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研讨会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孙周勇介绍了石峁遗址的发掘情况。他指出,石峁遗址系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理解“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面对一个4300年前的无文字文明,太多谜题难以破解:石峁遗址如此庞大的建筑规模和面积,其归属却难以确定。它处于北部塞外游牧文明和塞内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位于西北齐家文化和中原陶寺文化的中介点,对早期文明的交流与传播有何作用?石峁遗址极其奢侈的建筑用玉包含了当时怎样的文化观念和信仰体系?对这一系列问题,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解答相对受到学科的局限。在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课题研究中,实证性的考古学证据需要跨学科的文化阐释,尤其需要能够兼顾实证与阐释的方法论。

从石峁遗址的文化解读到中华文明探源的进路,历史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界提出的观点引起了较大关注。台湾“中研院”王明珂从文化认同的维度分析华夏认同与资源竞争的关系,认为以石峁为代表的玉石文化是人群走向阶序化、集中化的征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叶舒宪从石峁玉器研究出发,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体”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玉石神话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元素,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从精神文化领域统一了中国。他列举了四类玉器的史前传播分布路线,说明华夏史前先民在不同地域不约而同地生产和使用玉礼器,其背后是共同的玉石神话信仰。四川大学杨骊则从方法论角度呼吁考古学与文学人类学的对话,主张在中华文明探源中,不仅要继承当年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更要通过人类学的第三重证据和考古学的第四重证据之间的互证互释,实现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的融合。

玉文化被费孝通称为“玉魂国魄”。2000年初,他倡议国家重视对玉文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国内的文学人类学界延续这一思路,大力推进中国玉文化研究。此次会议关于玉石文化的讨论分为文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两条路线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王仁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孙志新,都从考古学视角研究玉兵器的演变轨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玉石做成的兵器变成神圣的祭器,把“祀与戎”合二为一,这蕴含着怎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符号内涵?叶舒宪用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演绎论证了华夏先民使用玉兵器的文化心理,对石峁建筑用玉以及多人头颅坑的现象,他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第三重证据和考古学发掘类似情况的第四重证据进行证明:玉石兵器与人牲用于建筑,这根植于先民的避邪观念,是一种建筑巫术。从此次会议可见,与考古学相比,文学人类学更侧重文化研究,从人类神话思维法则出发,探究玉石信仰背后的文化大传统,试图重建一条贯穿史前与文明时代的文化通道。

从20世纪末中国学者提出“玉石之路”以来,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以“玉石之路”为主题

的研讨会，把相关研究提升到文化战略高度，反映了中国人文学界日益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对玉石之路的研究，其实质如叶舒宪所说，是超越李希霍芬根据文献知识所做出的“丝绸之路”的小传统知识命题，回归更为久远的玉石文化大传统研究，进而深入到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价值观研究。作为中华文化探源的重要一环，玉石文化可以说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物的民族志”，从考古学和文学人类学结合的视野深入解读这部民族志，或许会揭示出一条研究中华文明发生的特殊奥秘和核心价值的路径。